

「天宮課堂」強化港澳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張惠達

教聯會理事

教聯筆陣

2026年世界盃，佛得角40歲門將禾仙夏一戰成名。他原名祖斯馬，卻以「Vozinha」之名征戰綠茵。這個暱稱意為「嫵嫵」，源於他自幼由祖父母撫養長大，踢球常被同伴取笑「輸了回家找嫵嫵哭訴」的稱呼，最終被他選為職業生涯的名字，成為對祖父母最深沉、最恒久的致敬。他25歲才獲得第一份職業合約，窮困時甚至在碼頭當苦力幫補家計，因不捨得離開阿嫵阿爺而放棄外流機會。這份源於對親人的思念與感恩，最終化為他為國征戰的磅礴力量——他守護的不僅是佛得角的球門，更是「阿嫵」賦予他的身份與尊嚴。

家庭啟蒙與培養

正如電影《給阿嫵的情書》之所以引發全球華人共鳴，正因為它以樸素影像直抵人心，「家國情懷」在電影中獲得了最質樸也最透徹的詮釋。禾仙夏的故事與這部電影的巧合，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教育命題：國民身份認同的種子，往往最早播撒在對親人的思念與感恩之中。當一個孩子從「阿嫵」的守候中學會牽掛與責任，這份情感便有了最堅實的土壤，日後自然能夠延伸為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

而首位港產航天員黎家盈，恰好是這樣一位青少年榜樣。黎家盈祖籍廣東順德，父親上世紀50年代從家鄉移居香港，「父親經常提醒我和姐姐，我們是順德人，有國才有家」。父親更從小教她們唱國歌，「雖然我們是在香港出生長大的，但父親讓我們在心底建立了深厚的家國情懷」。這份來自家庭、源自父母言傳身教的情感熏陶，是黎家盈國民身份認同最初、也最堅實的根基。她從警隊科技專家起步，擁有港大博士學位，2024年入隊訓練，在極短周期內完成八大類200餘項訓練科目，以優異成績通過飛行資格評定。2026年9月9日，她以太空教師身份在天宮空間站為港澳學生授課，其母校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作為直播主場

館，她引領學生參觀太空廚房、睡眠區，示範微重力科學實驗。

該校學生陳梓祺看完「天宮課堂」後說：「家盈師姐曾經在這間學校學習、成長，而這一刻她已成為航天員，令我聯想到，其實我們夢想的起點，會否是大家此刻腳下的這片校園？」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黎家盈在香港土生土長，「她的故事告訴大家，航天夢從來不是遙不可及，只要勇於追夢、奮發圖強，香港人同樣有可能翱翔星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航天事業貢獻力量」。

家國情懷須從小建立

這正是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2026）所期許的效果——該架構以「立根中華、聯通世界、擁抱未來」為總體方向，強調「從小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自幼建立社會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將國民身份認同列為12個首要價值觀之一，要求初小生「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高中生則要「為建設香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積極貢獻力量」。黎家盈的飛天故事，恰恰證明了國民身份認同必須從小建立、從情意生根、從行動彰顯。她不是憑空出現的英雄，而是香港的校園中成長起來的「家盈師姐」——她的存在讓每一個香港孩子明白：身份的認同不僅是成人後的選擇，而是從童年開始、在日常中一點一滴浸潤而成的歸屬感。

從佛得角門將禾仙夏以「嫵嫵」之名守護國家榮譽，到港產航天員黎家盈在天宮空間站中為港澳學子點亮夢想——家國情懷的根，從來都深植於對親人的思念與對國家感恩之中。支撐中華民族一次次在劣勢中逆襲的，正是一代人對國家與民族最深沉的認同與擔當。而這份認同，就像從「阿嫵」守望家人的目光開始，從校園中的孩子以「家盈師姐」為坐標，眺望星空的目光開始——它讓每一個香港青少年都知道自己是誰、來自哪裏、將往何處。

完善行政主導 提升治理效能

何達基

香港城市大學全球治理與創新研究院院長 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王治國

香港城市大學全球治理與創新研究院研究員 院長助理

對香港而言，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結合香港自身的制度傳統、社會結構和國際聯繫，將既有治理資源轉化為更加協同、更具韌性的治理能力。行政主導需要與有效監督、理性協商和廣泛參與相互支撐，才能真正轉化為穩定而持續的治理能力。面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香港更需要把制度優勢落實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緊密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節奏，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行政主導的效能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是較強的政府能力和政策執行力，使公共政策能夠形成明確目標並轉化為具體行動。

與此同時，集中統一的政策協調與基層參與、專業諮詢、社會協商之間形成互補而非替代，這正是政治整合與社會參與並行不悖的體現。

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具有必要的適應性，在基本框架保持穩定的同時，能夠根據經濟社會條件變化調整治理重點和政策工具。行政主導因此並非單純意味着權力集中，其治理效能更取決於權責配置、政策協調、社會參與和制度調適能否形成有效銜接。

行政主導下政府權力仍受監督

西方政治理論較多以自由民主、代議制和選舉競爭作為觀察現代政治的重要尺度，這一傳統對理解西方政治制度自有其意義，但用它衡量所有治理模式，解釋力便顯出邊界。若簡單將行政主導歸入「威權政治」的框架，容易忽視其具體的憲制基礎、國家能力、社會參與以及實際治理績效。理解行政主導，需要考察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如何形成治理能力，又如何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

這種因時而變的治理智慧，亦能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到呼應。《周易·繫辭下》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講的正是制度需要在環境變化中保持與現實的適應性。《宋史·王安石傳》記載，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提出「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主張把握制度精神而不拘泥於既有形式，並倡言「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這一古老命題固然不能與現代行政體制直接對應，卻揭示了一種守其原則、因時而變的治理智慧，為理解中國治理傳統中的制度調適提供了思想資源。

形成強大治理合力 有效回應發展需要

對於香港而言，行政主導的制度邏輯最終仍需落實為現實治理能力。2025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時強調，「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一要求的重點，正在於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進一步理順權責關係、提升施政協調能力，使「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制度安排更有效地回應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需要。

行政主導不意味着行政權力缺乏監督，也不意味着社會意見被排除在治理過程之外。對於香港而言，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將行政主導轉化為符合自身歷史條件和社會結構的治理能力。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今年1月在「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專題研討會上致辭強調，「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關鍵是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強化香港、澳門當家人意識，切實擔負起治理香港、澳門第一責任人的責任。」

香港長期形成了與內地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治理傳統，實行行政長官負責制，政府規模和社會自治程度也具有自身特點，不能簡單照搬內地治理經驗。但制度環境的差異並不意味着治理原則無法相通：行政權責是否清晰、政策協調是否有效、監督機制是否健全，以及社會意見能否順暢進入治理過程，仍是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

釐清對行政主導的認識只是起點。行政主導的完善，也不意味着行政、立法與社會之間形成單向關係。相反，香港需要在明確行政責任的基礎上，形成行政與立法之間的良性互動，並發揮社區組織、專業團體、諮詢機制等社會平台的作用，使社會訴求能夠及時進入政策形成和執行過程。內地民眾參與渠道將分散民意轉化為可核查、可追溯行政數據的思路，對香港完善諮詢架構、優化施政回應機制，同樣具有借鑒價值。夏寶龍在「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專題研討會中的致辭同時強調，「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需要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積極支持配合，形成強大治理合力。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作配合是行政主導體制的要義所在。」

理順權責關係 減少制度摩擦

換個角度看，行政主導的核心在於理順不同主體之間的權責關係，減少無謂的制度摩擦，將監督、協商和社會參與轉化為改善施政的制度資源。

香港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既有制度積累，又能讓散布於特區政府內外的治理資源，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形成更加緊密的協同。新一屆立法會可以在依法履行監督職能的同時，加強與特區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的溝通協作；社區組織和專業團體則可以更穩定地承擔民意收集、社會溝通和公共服務等功能，使政策制定更貼近社會實際。行政主導最終要回答的，是能否形成一個權責清晰、運轉順暢、能夠及時回應社會反饋的治理體系。沿着這一方向推進，才能更好發揮香港自身優勢，持續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正確認識行政主導，首先需要超越以單一制度形式衡量治理效能的思維慣性。行政主導的價值不在於行政權力本身的擴張，而在於能否形成權責清晰、決策有效、執行有力，同時具有監督、協商和自我修正能力的治理體系；在於不同治理機制能否形成有效銜接，這是特區治理實踐留給觀察者的重要啟示。

立足中華底蘊 深耕科藝融合

陳雪儀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主席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規劃專上教育用地，預計於2026年起分批推出。社會建議整合逾22公頃用地，將該區打造為全新應用型高等教育集聚地。特區政府亦將洪水橋定位為「應用型高等教育及國際化人才培養中心」。配合北部都會區整體發展布局，本區有望成為香港推動藝術科技、文化轉化與跨域創新的重要示範節點。筆者認為，北都大學城的藝術教育優化發展，應以「文化為根、科技為用、品德為魂、跨域為徑、產業為果」為核心理念推進。

首先，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樞紐，唯有立足中華文化深厚底蘊，以傳統美學與哲學智慧為當代藝術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方能塑造難以複製的城市創意特色。教育工作者在培育下一代時，不單要教授數字創作技術，更要把《易經》陰陽辯證、道家「天人合一」與《道德經》等傳統品德思想融入創作實踐，引導青年思考人與科技、自然的關係，建立兼具文化底蘊與數字素養的價值觀。同時，藝術教育肩負着重建青年文化認同與凝聚社會共融的作用。透過系統化的中樞文化藝術課程，能讓青少年在主動創作中確認身份歸屬感與國家認同，並促進大學城內本地、內地及海外師生多元共融。

其次，藝術與科技融合已是全球趨勢。香港科技大學於2024年設立藝術與機器創造力學部，標誌著本港已具備穩固的科藝融合教研基礎。洪水橋作為全新大學城板塊，應進一步深化文化藝術科技學科建設，建立涵蓋本科至高階人才的培訓體

系。在課程構建上，科技層面可納入AI協同創作、3D資產建模、XR沉浸式體驗及數字學生設計，精準對接新興數字崗位；跨學科層面應推動藝術結合科學、醫療、心理與生態，發展藝術療癒與社區營造，發揮藝術解決社會議題的功能；產業實踐層面則涵蓋版權法、品牌策劃、數字營運及IP開發，培育市場思維並推動原創IP升級；文化品德層面則以中國藝術史、非遺數字化及科技倫理為必修，確保創新有根、發展有度。

最後，北都大學城需打破學科、產業與地域邊界，建構多元協同的發展網絡。在跨學科層面，可設立傳統美學與數字互動實驗項目，推動藝術、工程與數據科學聯合研發，創造兼具中式美學與科技感的互動作品。在產業合作上，應善用周邊物流及高端服務資源，連接大灣區數字科技力量，透過動漫、數字影像與虛擬藝術等新媒體活化傳統文化，推動文創IP產業化並打入年輕消費市場。在跨文化層面，則可配合非本地生收生政策，引入「一帶一路」國家藝術人才駐校交流，開設中西藝術比較課程，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對話平台的獨特角色。

科技技能可以複製，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人文素養難以模仿。透過大力發展文化藝術科技學科、完善跨域課程體系及推動產學研協同，大學城將能為香港培育兼具文化深度、科技素養與創新思維的新一代人才，帶動文創及AI產業高質量發展，助力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大灣區融合發展及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貢獻力量。

美欲打響科技冷戰 主導AI話語權

何志平



上周末美國頭部人工智能企業Anthropic CEO阿莫迪、OpenAI CEO奧爾特曼和SpaceX CEO馬斯克在社交媒體平台，呼籲人工智能公司放緩前沿發展，並聲稱「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優勢可能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風險」。在硬核科技賽道高速演進的當下，技術本身的迭代速度固然重要，但構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亦迫在眉睫。美國科技巨頭看似着眼於全球AI安全，實則心口不一，暗藏大量針對中國的遏制條款，不過是一場披着技術外衣的霸權行徑，旨在打造對華冷戰新劇本，主導AI治理國際話語權。

2025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創世紀計劃」（Genesis Mission），致力將美國推向「全球最大、最具創新性」的AI生態圈，標誌著美國將人工智能視為國家存亡級的戰略問題。從「曼哈頓計劃」到「太空競賽」，再至如今「創世紀計劃」，美國國家戰略思維一直將科技創新當做大國競爭的關鍵。新一輪全球大國競爭已發生根本性變革，美國將科技競爭視為中美戰略博弈的核心，不僅涉及AI、量子資訊、生物醫藥等前沿科技，還深入應用技術與研究；競爭邏輯更加側重國家安全，內核則涵蓋技術壟佔和標準制定的雙重目標。

打壓中國 鞏固霸權

特朗普政府明確提出AI既是美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掌控全球話語權的關鍵。AI在軍事、金融、製造等多領域的交叉赋能，將深度嵌入無人系統、網絡攻防以及全球秩序與治理規則，AI的未來就是美國的未來。誰主導AI，誰就能主導世界。但顯然中國近年在AI領域的持續壁壘突破，尤其在算力、代碼能力、多模態融合等核心技術上的領先，正成為美國眼中的最大威脅。對華科技政策從「脫鉤斷鏈」「小院高牆」，到頻繁運用多重手段，對中國科技產業進行封鎖圍堵。

2026年2月，Anthropic在公告中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MiniMax稀有科技三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其AI模型實施所謂「工業規模的蒸餾攻擊」，並「系統性抽取美國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對美國造成「重大國家安全風險」。之後OpenAI、Google等與Anthropic彼此競爭激烈的企業，通過協調立場、共享信息，攜手共建企業反「蒸餾」協同機制。美國政府則快速跟進，短短四五個月之間，國會聽證、白宮備忘錄、企業聯名控訴接踵而至，將一個原本業界通用並旨在降低算力門檻、推動技術普惠創新的中性操作方

法，包裝成「知識產權竊取」的代名詞。究其根本，無非是中國AI業的快速發展觸動美國敏感神經，其在極度焦慮下試圖以捏造罪名方式來打壓和制裁中國，維持美國先進性。

阿莫迪早在2025年1月DeepSeek橫空出世時就說，「必須阻止中國獲得數百萬AI芯片，才能確保美國在AI領域建立持久且決定性的領先優勢」。他們怕中國的開源模式搞得太快，原因在於美國前沿大模型單次訓練投入已達數億美元量級，研發投入成本壓力巨大；而中國AI大模型堅持開源開放，這種普惠模式正從根本上改變全球人工智能競爭格局。特別是今年月之暗面發布的Kimi K3開源模型，效果已可媲美OpenAI和Anthropic等閉源公司的先進模型。

本次阿莫迪更是將技術問題政治化、集團化，提出要嚴控芯片對華輸出、打擊「蒸餾」以阻斷技術路徑、嚴防模型參數外洩，要先卡脖子拉開差距，才能再有條件地與中國談共同減速。未來3至5年，AI產業將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深刻影響。美國科技企業在這一戰略機遇期內，需要配合美國政府攫取更多地緣政治利益。

心口不一 掌控AI領域規則制定權

Anthropic等幾家美國科技巨頭選擇在此節點繼續炒作相關議題，正是一齣AI領域的「冷戰劇本」。其一污名化中國AI發展，其二為後續更嚴厲的技術管制做輿論動員和政策鋪墊。在芯片封鎖之後，再將管制工具精準指向模型和演算法層面；其三以製造「安全威脅」敘事，為對華技術遏制提供合法性，從而將芯片禁運、蒸餾管控、權重封鎖這一套單邊遏制舉措，包裝為「AI安全的通用準則」體系，並將安全評估、技查許可權等標準牢牢攥在美國手中；其四揮舞「合规」大棒干預全球AI產業，把眼下短暫的技術領先固化成長期制度特權，剝奪其他國家公平發展人工智能的機會。

美國歷來說一套做一套，在實踐上搞雙重標準。Anthropic帶頭呼喊「放緩」，自家公司計劃於10月底至11月初掛牌上市的節奏一點沒變。美國政商一體，實質上只是利用部分企業的商業訴求，渲染科技博弈對抗氛圍及全球科技冷戰和科技體系分裂，戰略壓制中國發展，維持並擴大中美間的科技差距，從而保持其全球AI霸權地位。然而，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深度交織的技術生態中，當一項技術已成為推動全球發展創新的驅動要素，任何企圖以政治手段將其私域化甚至武器化的行徑，最終都將反噬其身。